

中美关系

美专家称应反击中国“威胁”

美国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专家、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6月6日在福克斯新闻网发文称，尽管当前美国内忧不断，但仍应重视中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卡拉法诺赞扬了特朗普政府近来的对华施压政策，称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应对中国日益扩张给美国和全球带来的挑战。此外，他还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五项建议，以继续保持对华强硬：

第一，别和中国做交易。外交官喜欢通过权衡和让步来获取对等的利益交换，但这种交易不适用于复杂的中美关系。美国不应一厢情愿地认为在贸易上让步，就能换来中国在朝鲜和南海问题上退让。美国应该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任何与中国的争端。

第二，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特朗普政府计划取缔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举动可能会让中国重新考虑新安全法。美国不能忽视强硬手段，让中国为其“错误”买单是最好的政策，否则，中国将认为美国不过是其实现全球“野心”进程中的减速带而已。

第三，团结盟友。美国应该团结“自由世界”的盟友，以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美国应该领导“自由世界”国家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实现经济复苏。

第四，坚持与中国“缠斗”。为引起中国的重视，美国必须有效“瞄准”中国，包括打击其经济命脉。中国企业需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来获利，若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中国企业，显然能够引起它们的注意。

第五，避免伤及自身。对华政策既要有效，也要维护美国的自由、安全和繁荣。

美学者宣称中国以“侵略性”方式回应敌对国际环境

6 月 10 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分析师陈彦 (Lucas Tcheyan) 和该中心主任韩磊 (Paul Haenle) 撰文称，中国正以“侵略性”外交政策回应敌对的国际环境。

文章称，近年来，中国扩大了外交和经济关系，这引发了各国对中国的技术政策和胁迫性外交政策的担忧。例如，白宫报告称中国力量正在“伤害美国利益和其他国家或个人的主权和尊严”；欧盟将中国贴上“系统性竞争对手”和“经济竞争者”的标签，同时正在重新评估华为作为 5G 基础设施供应商的地位；在亚洲，越南去年发表了十年来的首份国防白皮书，批评了中国的海洋战术，菲律宾等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也正在发展军事力量以回击中国的扩张；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

文章宣称，面对这一国际环境，中国采用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中国外交官经常被贴上“战狼”的标签，他们威胁要进行经济报复或在社交媒体上责备那些回击北京的外国政府。此外，北京还试图对批评者进行审查。

文章认为，中国似乎不会转变目前的“侵略性”外交策略，中国似乎认识到可以利用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不和。而特朗普政府目前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过度反应，要求盟友和伙伴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这也许会为北京推进其战略目标敞开大门。更好的做法是，美国应该利用各国日益加剧的担忧，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结盟，对中国进行反击。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针对中国提出严厉制裁方案

6 月 11 日，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发布报告《加强美国实力：

抗击国际威胁》。报告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建议美政府对华实施严厉制裁，并声称这是“国会有史以来提出的最强硬制裁方案”。

报告称，中国主要在几个方面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中央控制型经济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胁迫工具所推动的，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行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和网络信息宣传攻击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报告称，贸易和经济合作并没有促使中国民主化”，今后美国必须至少从五个领域开始反击中国：首先，美国必须回击中国的工业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恶意的经济行为；第二，美国必须阻止中国不良的政治影响和造谣活动；第三，美国必须反击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第四，美国必须对抗中国的全球军事现代化；第五，美国必须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联盟。

关于香港问题的选择：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备忘录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近期登载《关于香港问题的选择：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备忘录》。文章由该中心专家白明 (Jude Blanchette)、车维德 (Victor Cha)、葛来仪 (Bonnie Glaser)、迈克尔·格林 (Michael J. Green)、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共同撰写。

文章称，在中国进行涉港国安立法后，美国国务卿已通知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国会大力支持进一步采取行动，向北京施加压力。不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却不那么坚决，而且对中国施压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最大打击。

文章称，美国需要继续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兑现美国对盟友明确、一贯的承诺，支持民主准则，反对中国胁迫独

立国家或民主实体。同时，美国政策需尽量避免损害香港作为大中华区金融中心的地位。具体而言，文章提出以下建议，这些建议将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一次召开的会议上被讨论。

方案一：外交施压。该方案主要依靠建立一个国际外交联盟来向北京施压，告诫其在没有香港人民、立法和司法机构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不得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并警告中国不要违背其“一国两制”中维护香港自治和自由的承诺。方案可以包括发表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和/或联合国联合声明。

该方案的好处包括：避免局势过早升级，让北京有时间修改或收回政策；在中国因疫情早期处理不当而受到批评之时，给中国带来声誉风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外长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举动，这为方案提供了支撑；方案标志着联盟可能愿意在以后施加成本。方案的缺点是：没有让北京付出实质性代价；北京似乎认为现在的国际态势对其有利；北京很可能会威胁对加入联盟的其他国家采取惩罚性的经济措施。

方案二：有针对性的制裁。根据《香港人权和民主法》，美国可对侵犯香港人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安全当局实施制裁。根据新提出的“香港自治法案”，美国还可对与个人和实体进行“重大交易”、“实质上有助于违反”北京对香港自治的法律承诺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

方案的优点是：显示美国阻止北京进一步实施法律的决心，以及美国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允许美国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北京的打击力度；留下更重要的杠杆，供日后美国需要影响北京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的方式时使用。方案的缺点是：北京有可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工具报复在中国大陆经营的美企；制裁可能不会动摇北京实施新法律的决心；制裁香港官员会增加投资者和商业的不确定性。

方案三：取消香港在美国法律下的地位。根据《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权和民主法》，特朗普政府可认定香港没有“足够自主权”，不能继续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这将授权美国以对待中国其他地区的方式对待香港，包括在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健康和标准、引渡、航空公司以及旅行和移民方面。

方案的优点是：最有助于阻止北京通过新法律或以粗暴的方式执行该法，因为这些措施将损害香港和珠三角周边地区的经济；通过展示领导力，美国可以为其他民主国家效仿打开大门，进而增强对北京的威慑力。方案的缺点是：将对香港而非中国其他地区造成最直接的损害；希望保护城市自治的香港人将处于较弱的地位，无法利用香港尚存的任何公民空间来重申他们的立场；美国贸然行动反而可能促使北京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让其认为等待的时间越长，香港的颠覆活动就会越多。

文章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美国必须尽可能将香港问题国际化，使其努力与盟友的努力保持一致；美国应该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做好准备，并留意美国公司可能受到的报复；众议院委员会应准备好应急计划，如果北京朝着要求取消香港地位的方向发展，需从香港撤离美国公民；国务卿应准备一份关于香港的重要讲话，并推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传递出类似的信息，同时，讲话应该为北京留下缓和的余地。

美国外交

美学者称美加强海外实力应从弥合国内分裂做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6月5日登载该中心54位学者联合署名的文章称，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衰退以及

暴力示威，使美国社会出现新的裂痕。现在，美国在海外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内分裂的弥合与团结。

文章称，国内弥合分裂和团结一致事关国家安全，同制定所有国家安全战略一样，这需要深思熟虑和不懈努力，各级领导者必须：努力解决种族主义、社会不公等系统性问题；认识到，经济不平等威胁可持续增长以及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进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修复由于军方卷入美国政治而受损的军民关系，军队必须置身于党派政治之外；保护新闻和宗教自由，这是美国对其宪法以及对世界的承诺；树立榜样，倾听他人观点，通过相互尊重的辩论寻求集体解决方案。

文章承诺，在国家危机时刻，CSIS 及其人员以及许多同行机构，将致力于弥合分裂、促进团结，并努力说服国家领导层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坚持非党派的、以事实为导向的战略解决方案，以应对政策挑战。

哈斯：国内危机使美国在海外变得脆弱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 6 月 5 日登载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的文章称，国际事务分析人士很少关注美国的国内状况如何影响全球影响力和作用，但今天这种关联性不能再高。新冠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冲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暴力抗议，可能对美国的影响力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文章称，美国在国内树立的榜样、在国外树立的形象，要么会放大美国实力，要么会削弱实力。1968 年的一句话现在仍然适用：“全世界正看着。”由于美国的长期政治分裂和政治功能紊乱，以及总统特朗普在国际上不受欢迎，近年来人们对美国榜样的信心一直在减退。美国对疫情的糟糕应对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

美国能力的怀疑。现在，在世界的眼中，美国“山巅之城”的形象越来越遥远。此外，当前的政治危机也阻碍了美国在海外促进和保护民主。世界各地的民主状况都在倒退，而美国阻止这种倒退的能力也在下降。

一个经济问题严重且内部分裂的国家，在国际上能采取行动吗？答案未知。美国现在的国内冲突，可能会抑制其对外干预的兴趣。但若美国不保护自己的利益，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过度扩张。对手将看到并利用美国被国内问题削弱和分心，进而采取行动，美国的利益和稳定因此受到影响。

世界状况正在恶化。传统的安全议程重新浮现，包括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崛起且更加自信的中国、伊朗及朝鲜等实力越来越强的敌对中等大国。更重要的是，还出现新的安全议程，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与此同时，美国正遭到削弱，陷入分裂，注意力被分散。

威胁不会自我控制或消失，美国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不采取行动的不利后果。历史没有暂停键，美国迫切需要团结起来，铲除种族主义，恢复经济，弥合政治分歧，这既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世界。

美智库分析如何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的网络安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6月9日发布报告称，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上升，一旦发生网络攻击，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报告探讨了人工智能涉及的关键安全问题，以及决策者该如何应对。

报告称，人工智能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是，敌人直接控制人工智能系统，或者通过传递恶意输入信息产生间接影响。对许多政府而言，考虑人工智能安全的下一阶段将需要弄清楚如何践行

有关透明、审计和问责的想法，以有效地解决不安全的人工智能决策过程和模型数据泄漏的风险。具体包括：

首先，透明性要求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的文件记录程序，对模型的开发、测试及其结果进行严格的文件记录，使专家能够识别安全风险；其次，文件记录程序让政府能够开发有效的测试和检查技术，以及认证项目，为人工智能开发者和用户提供明确的指导；最后，决策者将在确定问责机制和责任制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便发生安全事件时管理人工智能，进行相应的奖惩。

人工智能系统在关键领域的普及，表明这些系统的安全有多么重要。这要求政府认识到通过透明的指导方针、认证和检查标准以及问责措施，可以最好地保护这些系统。

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蔓延至外交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近日撰文称，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已经“传染”至其外交政策，文章摘要如下：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本应让美国人团结起来。但在一个制造分裂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社会正在被撕裂。美国外交已经“感染”两极化。政策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每届政府结束时其所做的承诺都会随之失效，机构政治化、分歧“部落化”。国内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正蔓延至国际事务。过去，共同的国内目标为美国外交提供了压舱石，而现在，它的缺失削弱了美国外交。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首先，美国的公信力、可靠性和能力声誉受损。如果连美国人的民选代表都不愿支持谈判达成的协议，甚至在其墨迹未干之前就抛弃它，那么美国的朋友或敌人又有什么理由要与美国进行

任何形式的真诚谈判？即使谈了，它们为何要对美国政府会兑现承诺抱有信心呢？如今，美国政府连让国会通过预算都做不到，更不用说让全世界一起阻止一场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的蔓延了。

其次，两极化破坏了外交的非政治角色。作者曾经为 10 位国务卿工作，他们都谨慎地将国内政治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蓬佩奥则是最具党派色彩的国务卿，他系统地排挤专业人士，支持政治盟友，对想象中的“深层国家”发动战争，享受政治冲突，攻击“反对派”媒体，撤回保障措施，并且几乎毫无掩饰地把国务院作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平台。

最后，当美国国内政治“不妥协”的特点也成为外交的特点时，外交的潜力会被削弱。2003 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军向萨达姆部队投放了一本翻译错误的小册子。它把“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翻译成了“投降，然后死亡”。用后者形容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外交谈判方法再贴切不过，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的莫过于向伊朗“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并非第一个接受“懒惰的”极限主义的政府，但在煽动外交政策两极化方面，它比任何政府做得都多，在美国最需要外交潜力的时候扼杀了它。

去两极化是困难的。美国的两极化是一种特别尖锐的两极化，其存在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长、根基更深、涉及面更广，是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分歧的综合产物。一项更能体现美国公众而非政治精英关切的外交政策，是去两极化的良好开端，但这还不够。美国领导人必须取得成果——在国外要有更强的纪律性，在国内要有政治技巧，而不仅仅是迎合票仓的倾向和喜好。

美学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

新冠肺炎疫情是继冷战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第二大挑战，不过，在疫情暴发前，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已经在终结。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近日发布报告称，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已经在终结。报告摘要如下：

过去 10 年间，两大因素导致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走向终结。一是世界主要大国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背离了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盛行的对限制与强制的共同理解。在冷战结束后的 15 年里，美国盟友之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默许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到 21 世纪，世界秩序大幅偏离美国之前创立的准则，大国竞争重回国际舞台。

中国与俄罗斯捍卫 19 世纪的秩序模式，这种秩序是围绕权力平衡、国家主权和势力范围建立的。与此同时，美国疏远了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秩序传统。特朗普对美国盟友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并向盟国与对手国一并征收贸易关税，放弃支持世界人权与民主进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导条约》以及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二是世界事务在技术、经济以及环境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引发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生物科学新技术、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人们工作和消费信息的方式。这些变化挑战了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社会结构。这场社会剧变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打响。生产方式、服务提供、教育性质、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公共秩序所面临的威胁、能源与环境问题以及均势的意义都已经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危机常常催化甚至加速这种趋势，新冠疫情正是这种危机。

美国在世界秩序方面面临的根本性战略问题是：如何应对大国间达成的机制安排的崩溃。答案取决于哪种行动方式最能保护并促进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包括以下几点：预防并减少针对美国及其海外军事力量或其盟友的核武器、生化武器以及灾难性的常规恐怖袭击或网络攻击威胁；防止核武器扩散，确保核武器与核材料的安全，并进一步减少核武器中程与远程运载系统的扩散；通过美国的国内力量、国际力量与影响力、联盟体系的力量，维持全球及地区力量平衡，促进和平、稳定与自由，同时带动盟国与合作伙伴增加贡献；在美国边境预防敌对国家或“失败国家”带来的紧急情况；确保全球主要体系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美国发现，在过去 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主要大国几乎不可能像其所希望的那样，聚拢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对约束、限制和强制手段持有共同的理解。问题在于，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美国在能力范围内，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秩序观念？

对此，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创建一个有说服力的美国治理模式，这将加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更有效地利用美国的影响力，重振美国外交；恢复北美合作；从根本上改革美国与条约盟国及伙伴国的关系；与欧洲一道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具雄心；强化与印度的关系；推进新冠治疗与疫苗的国际合作；投资国际机构；将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国际恐怖主义等跨国挑战划分开来；在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角逐中挽回劣势，继续与中国展开竞争；减少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参与；与俄罗斯进行有条件的接触；重建并改革全球经济。

美国政治/其他

年轻一代是 2020 年美国大选的制胜关键

美国进步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年轻一代在 2020 年大选中很重要，选举活动以及候选人应当密切关注该群体，争取他们的选票。

文章称，美国年轻一代更偏向做无党派，他们根据政策偏好、候选人的价值观等因素来决定是否投票。这是因为他们很多都在“大衰退”前后成年，历经过种种艰难，难免对政党产生幻灭感。因此，候选人需要多关注年轻人在意的问题，制定对应的政策。

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仍有可能提升。18-29 岁群体历年最高投票率仅为 50%左右，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去年 9 月的民调显示，近半数人对大选“热情高涨”，而且相较于中期选举，年轻人更喜欢参加总统选举。因此，今秋年轻人的投票率可能大幅提升。

尽管年轻人热情不减，但某些限制措施可能会让他们难以投票。选举活动应当明确注册要求和截止日期，多在年轻人常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讯息，提供前往投票站的交通服务等，以方便他们投票。同时，还要多关注年轻人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以赢得他们的信任。

文章称，总之，年轻一代在此次大选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他们有信念、有热情，也愿意用行动建设社会。他们的声音很重要，应当在大选之前给予密切关注。

美刊：美国正在“放弃”抗击新冠疫情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 6 月 7 日载文称，美国商业恢复运

转，抗议活动在全美各地上演，然而新冠病毒并未远去，这将加剧疫情。文章摘要如下：

人们重新走上街头，不是为了庆祝抗疫胜利，而是为抗议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示威者聚集在全国各地，这毫无疑问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直言，大规模抗议活动为新冠病毒提供了“完美的”传播途径。

美国人希望病毒消失，但事与愿违。虽然东北部疫情有所缓解，使全国总感染人数下降，但美国其他地区的感染数量仍处于稳定状态，亚利桑那、北卡罗来纳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感染人数正在上升。而这些数字体现的可能是抗议活动爆发前的情况，因此，后面可能还会出现更高的峰值。

然而，越来越多的州在减缓病毒传播方面退缩了，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正逐步减少其活动。炎热的夏天已经开始，事实表明，美国将无法战胜新冠病毒。总的来说，美国似乎在慢慢地放弃。最可能感染病毒的人在为正义而战，这几乎肯定会增加他们被感染的风险，这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美式残忍。

美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反映了诸多问题：卫生保健系统几乎不适合处理国家级卫生危机，实施的“全民封锁”措施松散；长期的种族主义加剧了先前就存在的健康差距，该问题不可能很快消除；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缺少联邦政府的领导；参议院没有长期的经济救援方案；多个州还面临财政危机。

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掀起抗议浪潮

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多地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数百年来关于美国种族问题、警察暴力执法的讨

论重新被点燃。

在美国大范围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是主要诉求之一。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屡见报端。“警察暴力地图”（Police Violence Map）的一项分析指出，仅 2019 年警察就杀死了 1099 人，在 2014 年至 2019 年的“警察杀人事件”中，99% 的警察未被指控犯罪，更不用说被定罪。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拉尚恩·雷（Rashawn Ray）表示，在未袭击他人或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黑人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 3.5 倍，黑人青少年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 21 倍，每 40 小时就有一名黑人被警察杀死，每 1000 名黑人中就有一名被警察杀死。

“警察暴力地图”的数据显示，在内华达州里诺市、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等城市，黑人被警察杀死的比率最高，甚至高于美国的谋杀率。“警察暴力地图”通过分析 2013 年至 2018 年美国最大的 50 个城市的数据发现，暴力犯罪率与警察施暴的概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有两个不同的“美国”：在美国，人们可以携带枪支袭击州国会，冲警察大喊大叫，但仍能毫发无伤；在美国，人们和平地游行，或者站在自家门前观看，却遭到橡胶子弹和油漆弹袭击。

特朗普或将投票复杂化以扰乱大选

美国《政客》杂志网站近日登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教授金百利·韦勒（Kimberly Wehle）的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推特上攻击邮寄投票，并威胁要扣留相关资金以阻止各州推广邮寄投票。文章称，特朗普可能为扰乱 11 月的大选而采取五种措

施：

第一，由于新冠疫情可能在秋季二次暴发，特朗普届时可以发布全国隔离令，迫使选民在选举日待在家里。特朗普拒绝采取任何认真的联邦措施来应对新冠病毒，并将问题推给各州，因此，他在秋季下发联邦命令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他的确依法享有这个权力。

第二，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可以停掉美国邮政署（USPS）的资金，从而阻塞邮寄投票渠道。今年3月，白宫就曾否决一项向邮政署提供资金的两党法案。邮政署的运营资金最早在今年夏天就会枯竭，但特朗普似乎并不急着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特朗普可能鼓动其支持者出现在投票站阻止“选民舞弊”。随着各州因为疫情的缘故纷纷提前组织大选投票，特朗普可能会鼓励其狂热支持者在投票站周围散布负面消息，打击人们投票的积极性，尤其是利用少数族裔选民对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的畏惧，劝阻他们投票。

第四，特朗普可能会向其票仓州的政府官员施压，让他们改变投票规则，使新冠疫情期间的投票变得更难操作。红州政府官员向来对特朗普言听计从，如果特朗普呼吁针对各州限制投票，官员和州议会很可能会采取种种措施。这种政客插手选举、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情也发生过，佐治亚州州长布坎普（Brian Kemp）就曾用清除已登记的选民信息、关闭投票站等手段赢得选举。

第五，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将继续起诉那些尝试简化投票操作的州，以便在法庭上拖住他们的投票议案。目前，全美各地已经有多起诉讼待决，以决定到底该通过邮寄方式投票，还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投票站投票。虽然这些诉讼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但诉讼肯定要花时间，这些疫情期间的便民投票提议就可能会被搁置到秋季，从而达到特朗普阻碍大选的目的。